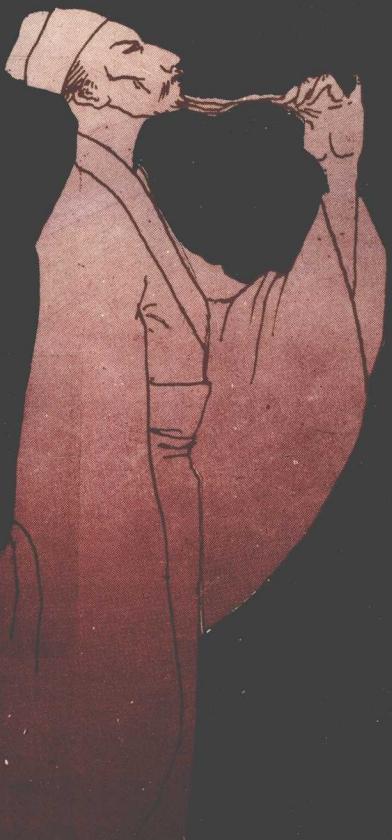


梅大聖 選評

蘇軾黃州詩文評注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苏轼黄州诗平注

梅大圣 选评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鄂新登字11号

苏轼黄州诗文评注

梅大圣 选评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黄冈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8 字数 245千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622-0896-4/I·77

印数：1—3000 定价：15.00元

内 容 提 要

北宋杰出的文学家苏轼因“乌台诗案”贬官湖北黄州后，心态和创作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部专著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独辟蹊径，以流畅生动的文笔，从苏轼被贬黄州的处境和心态出发，以时序、交友、环境各个断层对其转变时期艰难的心路历程和精神状态，作了多角度的深入探讨；对其在黄州的诗文，从作家本体和作品本体为立足点出发，作了入情入理的评析，颇能点出其美学含蕴，其中不乏新颖、独到的学术见解。从中能见出东坡作诗作文的处境及心态、为诗为文的苦心、作家艺术匠心和写诗著文的奥妙。将创作心理引入艺术鉴赏，本书做了较为成功的值得称道的尝试。此书不仅对苏轼研究有促进作用，而且对于研究宋代这一时期的政治、历史状况都是有意义的。

序

苏轼因“乌台诗案”贬官黄州，这和他过去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时的处境就完全不同了。在黄州，他是处于“罪废”的地位。虽然黄州远离京城，知州徐君猷对他又比较好，但他的政治处境仍然十分险恶。这一点苏轼自己很清楚，所以他到黄州后，一切行动都很检点。他的朋友陈季常约他去武昌，他不敢去，在《与陈季常》信中说：

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饰云：“擅去安置所，而居于别路。”传闻京师，非细事也。

有人请他写《燕子楼记》，他不敢写，在复信中说：

困踬之甚，出口落笔，为见憎者所笺注。儿子自京师归，言之详矣。意谓不如牢闭口，莫把笔，庶几免矣。虽托云向前所作，好事者岂论前后。

但是他的政敌们还是不放过他，这一年年底，他们便追查苏轼知徐州时“不觉察百姓李铎、郭进等谋反事”，经过苏轼的申辩，到次年七月才撤消“追查”。苏轼在《谢徐州失觉察妖贼放罪表》中说他在黄州的处境是“无官司削，抚已知危”。在《与滕达道》书中也说：“废放虽久，忧畏不衰。”

苏轼在黄州不但政治处境十分险恶，经济生活也是极为艰困的，他在《答秦太虚书》中说：

初到黄，廩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

后来他的朋友马正卿为他向郡中求得荒废已久的驻兵营地数十亩

进行开垦，苏轼像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唐代大诗人杜甫一样，亲自参加劳动，以解决“乏食”之急。

在上述艰难困苦的逆境中，佛老思想自然而然成了苏轼这一时期主要的处世哲学。但是，经世济时的儒家思想，仍然没有从他的思想中消失，他仍然关心国家的前途，人民的疾苦，努力要为国家、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他在《与滕达道》书中说：

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

又说：

粗有益世，瞑目无憾也。

这就是说，苏轼在黄州并不是完全消极的，事实上他并没有被压倒，他除了参加东坡劳动以外，继续读书写作。他手抄了《金刚经》，又第三次手抄了《汉书》，写了九卷《易传》、五卷《论语说》。同时还用他满蘸着感情的笔触写下了大量的诗、词、文、赋、书信，表达他的忿懑、痛苦、伤感以及对人生的探索，对人民的关怀，对黄州壮丽山川、淳朴民风、丰富物产的赞美。《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及《初到黄州》、《东坡八首》、《南堂五首》、《鱼蛮子》、《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念奴娇》（大江东去）等许多篇章都是使人百读不厌，常读常新的佳作。可以说，我们如果要了解杰出的文学家苏轼，要了解苏轼的创作途径，或者说要了解黄州这座历史名城的昨天，那就必须读苏轼黄州时期的文学作品。梅大圣同志在和其他同志完成《苏轼黄州词评注》之后，现在又单独一人完成这本《苏轼黄州诗文评注》，正适应了这一需要，是很有意义的。

这本《苏轼黄州诗文评注》有一篇比较详细而深刻的“前言”，论评了苏轼黄州时期的心态和诗文创作，对了解黄州时期的苏轼及其诗文创作，大有帮助。其次，这本书在选材上也是下过一番功夫的，例如所选《寿星院寒碧轩》这首诗，从宋代

以来，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是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苏轼第二次在杭州任上写的。但是《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九记寿星院石刻苏轼自书此诗后云：

仆在黄州，偶思寿星竹轩作此诗，今录以遗通悟师。
明明白白说是写在黄州的。大圣同志选入此诗是很正确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大圣同志治学严谨，不人云亦云。再其次，这本书的简评，往往都是在分析正文的基础上，用精炼的语言点出要害，发人深思。而且时有创见，不落窠臼。如《梅花二首》的评语，如《前赤壁赋》的评语就是例证。是书末还附有《东坡年谱简编》。关于苏轼年谱，据明万历康丕扬刊《东坡先生外集》卷首末云：

谱先生出处岁月者几十家，如汴阳段仲谋、清源黄德粹、五羊王宗稷、仙溪傅荐可，盖特详者。

据此可知明万历以前为苏轼作谱者已近十家了，明万历以后迄今，就我所知，又有好几种。但现在所能看到的苏轼年谱，或过详；或过略，或有差误，要选作广大读者的读物，似乎都不理想。现在大圣同志吸取诸种苏轼年谱的长处，从广大读者的需要出发，新编了《东坡年谱简编》，这对读者了解苏轼也是很有帮助的。

《苏轼黄州诗文评注》不是无瑕美玉，但如果我没有较深的诗文素养，没有对苏轼作过专门研究、对黄州有所了解的人，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这正是本书著者梅大圣同志的长处，所以他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向广大读者献上这部新著，为苏轼研究添砖加瓦。这是很可喜的。

苏轼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文学巨人，是我国光辉灿烂的文化史上的一颗巨星。对苏轼的研究虽然十年来有很大进展，但还有很多事应做，可做，希望大圣同志继续前进，做出新的贡献。

大圣同志写成此书后，送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并要我写

几句话，谨书此以应。

马兴荣

1992年5月于上海之忆邓泸斋

目 录

- 序 马兴荣
前言——论苏轼黄州时期的心态与创作 (1)

诗评

-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二首（选一） (29)
梅花二首 (32)
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 (33)
丫头山 (36)
少年时尝过一村院，见壁上诗云：“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不知何人诗也。宿黄州禅智寺，寺僧皆不在，夜半雨作，偶记此诗，故作一绝 (37)
初到黄州 (38)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40)
安国寺寻春 (43)
雨中看牡丹三首（选一） (45)
雨晴后，步至四望亭下鱼池上，遂自乾明寺前东冈上归，二首（选一） (46)
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 (48)
海棠 (51)
杜沂游武昌，以酴醿花菩萨泉见饷，二首（选一） (53)

五禽言五首并叙（选一）	(55)
武昌铜剑歌并引	(57)
晓至巴河口迎子由	(59)
次韵答子由	(61)
迁居临皋亭	(63)
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	(66)
岐亭道上见梅花，戏赠季常	(68)
武昌酌菩萨泉送王子立	(69)
东坡八首并叙（选二）	(70)
闻捷	(74)
闻洮西捷报	(75)
侄安节远来，夜坐三首（选一）	(77)
伯父《送先人下第归蜀》诗云：“人稀野店休安枕， 踏入灵关稳跨驴。”安节将去，为诵此句，因以为 韵，作小诗十四首送之（选六）	(79)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 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82)
红梅三首（选一）	(84)
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	(86)
二虫	(88)
寒食雨二首	(89)
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饮酒，以诗戏之	(92)
次韵和王巩六首（选一）	(94)
蜀僧明操思归书龙丘子壁	(96)
又一首答二犹子与王郎见和	(97)
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选一）	(99)
鱼蛮子	(103)

卷诗并序	(105)
李委吹笛并引	(107)
正月三日点灯会客	(109)
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	(111)
次韵孔毅父集古人诗句见赠	(113)
大寒步至东坡赠巢三	(114)
南堂五首（选二）	(117)
东坡	(119)
洗儿戏作	(120)
和黄鲁直食笋次韵	(122)
徐君献挽词	(124)
和秦太虚梅花	(126)
寿星院寒碧轩	(129)
别黄州	(130)
过江夜行武昌山上，闻黄州鼓角	(132)

文评

与朱鄂州书	(137)
黄州上文潞公书	(141)
记樊山	(146)
临皋闲题	(147)
与王元直书	(149)
答秦太虚书	(151)
答李端叔书	(156)
书蒲永升画后	(160)
石氏画苑记	(162)
记酿酒	(166)
记与安节饮	(167)

方山子传	(168)
答毕仲举书	(172)
记游松江	(176)
游沙湖	(178)
前怪石供	(180)
后怪石供	(183)
前赤壁赋	(185)
后赤壁赋	(191)
与子安兄	(195)
与范子丰	(197)
书《前赤壁赋》后	(199)
与蔡景繁	(200)
与彦正判官	(201)
书刘庭式事	(203)
书怀民所遗墨	(206)
记承天寺夜游	(207)
与李公择	(209)
记游定惠院	(210)
别文甫子辩	(213)
书韩魏公黄州诗后	(215)

附录

东坡年谱简编	(221)
后记	(245)

前言——论苏轼黄州时期的心态与创作

苏轼这位学富五车、多才多艺的文学家，因“乌台诗案”谪贬黄州。元丰三年（1080）正月一日，正当举国上下欢庆传统佳节“正旦”之际，他却正独携子迈凄凉就道，于二月一日到达贬所。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块重要的里程碑。其心态及创作都发生了令人震惊的转变。他在《答李端叔书》中说：“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晚年在《自题金山画像》中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其黄州“功业”，是他的心态常常达到超脱放旷的人生境界，是“今我”觉察到的与“故我”不同的对生命价值新认识，是对黄州人民的深刻理解，并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他在黄州时的创作进入到一个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时期。

（一）

探讨苏轼黄州时期的心态，离不开他的人文背景和气质。苏轼有非凡的文才，卓异的政见，入仕之时，鲜花曾簇拥着他。苏轼二十二岁进士及第名动京师。宋仁宗皇帝甚夸其才：“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苏轼传论》）可谓仕途荣耀。而其才能及浓烈的独立不随的气质又造成了他仕途悲剧。苏轼一生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致君尧舜”（《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爱国为民是他的最高政治理想。早在制科考试中就针对时弊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他曾十分自信地说：“使我不言，谁当言者”（《曲洧旧闻》卷

五引）。甚至还斗胆地批评宋仁宗无所作为，“未知勤”、“未知御臣之术”。他与熙宁间为相的王安石是好友，只要随世俗“惟荆（王安石）是师”，进用可必，而“然多不随”（《与杨元素》），与王安石“议论素异”（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看到新法某些方面已成为当世之过，便上疏反对，使王安石等皆不悦。这些正是苏轼“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忠君爱民思想在政治理想上的表现。不过，这种自知其不悦于世而仍不顾的“妄论利害，揅说得失”（《答李端叔书》）之举，这种卓异不随的独立气质，恰恰与封建朝廷、官场的需要格格不入，也就成了苏轼一生坎坷的内在因素。这就是苏轼的“故我”。

人们说，封建官场能有几多春风几许艳阳？果然，几经周折，他却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地位和身份的陡然下降，精神的痛苦和生活的艰辛也就随之而来了。苏轼《答秦太虚书》云：

初到黄，廩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用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

为解决生计大事，他只好率家僮垦荒、筑房。不过，这痛苦不能简单地视为他个人的私利，它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中国之文明及其学说，在于使人先义而后利。“乌台诗案”的爆发，使他失去了一次挽救北宋危局的时机；同时，封建官僚政治给予他的优越感顿失。这都超出了他的心理承受力。这样，黄州时期的心态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可以说，“乌台诗案”以前，苏轼更多的表现是关注社会，在无力改变北宋王朝“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严重的“积贫积弱”的“三患”形势下，导致“平生五百卷，一字不救饥”（《阳早发》）、“眼看世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初到杭州寄子由》）的心态。而黄州时期

的“今我”是“放臣”，他又始终不曾抛弃“故我”，执着于参预现实社会实践和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因此“今我”与“故我”常交战，他往往为谋生辛劳，在无能为力实现儒家伦理政治学说的极度痛苦中煎熬。请看：

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度关山。（《梅花二首》）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初到黄州》）

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以上为元丰三年作）

南来不觉岁峥嵘，夜拨寒灰听雨声。（《侄安节远来，夜坐》）

（元丰四年作）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寒食雨》）（元丰五年作）

空床敝败絮，破灶郁生薪。……那知我与子，坐作寒螿呻。（《大寒步至东坡赠巢三》）（元丰六年作）

去年花开我已病，今年对花还草草（草草：忧愁的样子）。
（《和秦太虚梅花》）（元丰七年作）

他失去的东西，构成了一个“情结”，使他心理严重失去平衡。但可贵的是，苏轼没有被压倒，相反进入超脱放旷的人生境界。他的超脱仅仅是短时期的，如果是彻底的，那他的心田会始终平静，而事实又不是这样。他的哲学智慧，足以使他依靠儒佛道思想中相通之处的合力，不断地消解情结，恢复心理平衡。因而他的人生价值仍得到充分体现。

我们必得承认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这就是：他一生中最初遭受的一大摧残之后，仍坚强活下来，济世救时之志犹存，靠的主要是儒家的思想力量。苏轼的思想实质是属于儒家。他信守的是儒家的道德准则，最主要的是一片仁心与安于贫穷。

“乌台诗案”在苏轼思想情绪上引起的波动是非常大的，他在湖州至京城的押解途中，曾试图纵身江流；他在狱中，也准备服药自尽。然而，他接受的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

的。他所坚持的入世所显现出来的乐观自信，以及对社会、对人生强烈的责任感是他得以活下来，帮助他摆脱眼前困境，而对人生作出新追求的勇气的主因。他对人生充满着儒家那种亲亲、仁民、爱物的胸怀。他一到黄州，就对那里的人民，那里的一草一木，怀有一种感人至深之情。这种对祖国山河、对人民、对生活的深情热爱，是他获得心理平衡而超脱乐观的力量源泉。《初到黄州》中描绘了一幅优美宁静的田园风景画：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在《东坡八首》里，他体味了劳动的快乐：

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

《南堂》饱含了筑新屋的欣喜：

一听南堂新瓦响，似闻东坞小荷香。

《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更流露了到黄州后与黄人亲密无间的和谐关系的喜悦：

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

他的政治理想在黄州始终没有泯灭：“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於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于造物。”（《与李公择书》）他“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与藤达道书》）。在这可贵的精神支配下，他关心国家安危，闻说官军收复失地，唱出了“放臣不见天颜喜，但惊草木回春容”（《闻洮西捷报》）的歌声；他悲歌为黎元，发出了“如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的呐喊，喊出了“但令人饱我愁无”（《浣溪沙》）的心声；听说岳鄂间农民因贫穷而溺婴消息，“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并写信朱寿昌太守要求革除陋习（见《与朱鄂州书》），并出资千金在黄州组织救婴活动。这种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执著精神是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

苏轼信守儒家的道德准则，必然安于贫穷。“固穷”的思想，使他有一种自克的力量。“固穷”，包涵着不畏贫穷，在贫穷中能坚持操守，安于贫穷等含义。君子忧道不忧贫，一直是儒家信奉的重要原则。《论语·卫灵公》：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宪问》：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孔子于此强调了士人应具备的道德修养。这正是苏轼在黄州困厄时期加强道德修养的精神支柱。如他在元丰五年作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中说：“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形容虽是丧家狗，未肯弭耳争投骨。”于穷困中坚持操守的气节宛然如见。对于困苦生活，他在《与李公择书》中云：“口体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与王直书》亦云：“江边弄水挑菜，便过一日。”黄州地处陋邦，“气象昏昏”（《与章子厚书》），他却“已将地狱等天宫”（《次答元素》）。儒家的对社会、人生的责任感，仁人相爱之心，以及“固穷”的思想，帮助苏轼克服心理失衡，而走向心境的平静。

同时，苏轼还在精神痛苦、灵魂疲惫之时，从佛老美学思想中寻求心灵的平衡点与衔接点，把他们作为心灵净化的良药和信仰力量，以便从束缚中超升出来，重新肯定一种廓然大公的思想与操持。苏轼在少年时代接受了道家教育，在熙宁四年，又见《庄子》而得其心：“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耳。”（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所以在他承受那么多的忧伤、痛苦和不安之际，以内在超越为其特征的道家思想在黄州得到急剧发展。《答秦太虚书》云：

吾侪渐衰，不可复作少年调度，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